

华与罗
世界文明与比较政治研究 第一辑

中华文明

希腊罗马文明

比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

NATIONAL GOVERNANCE: CHINA AND GRECO-ROMAN
IN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AL PERSPECTIVE

高奇琦◎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华与罗”世界文明与比较政治研究 第一辑

中华文明—希腊罗马文明 比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

National Governance: China and Greco-Roman
in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al Perspective

高奇琦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广州·上海·西安·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比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 / 高奇琦
主编. —广州: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6.6
ISBN 978-7-5192-1569-9

I . ①中… II . ①高… III . ①国家—行政管理—研究—中国
IV . ① D63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3347 号

中华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比较视野下的国家治理

策划编辑 孔令钢

责任编辑 黄 琼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25号

[http: // www.gdst.com.cn](http://www.gdst.com.cn)

印 刷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0

字 数 325千

版 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192-1569-9

定 价 60.00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从世界文明视角出发来研究比较政治

对中西文明的比较、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评价，以及对未来中国政治发展方向的展望历来是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关注的重点问题。徐达华先生 2013 年在新浪网与凤凰网上以“华与罗”为笔名在“关于中国民主化的探讨”的博客上发表了相关的系列研究文章，希望得到有关学者的批评、商榷与改进。该系列研究文章（后简称“博文”）围绕世界文明与比较政治等题目，从文明的历史发展路径入手，展开了深入的研究与探讨。徐达华先生以自己深入细致的理论思考和几十年来对于中国社会沧桑巨变的切身感受为基础指出：应该正确评价改革开放 30 多年以来中国的政治发展成就，正确认识西方民主的局限与缺失，并在世界文明比较的视野下积极总结中国民主政治的独特性及其对世界的意义。徐达华先生系列博文的内容具有丰富的整体性、战略的前瞻性和深邃的思想性，并且其中有众多非常深刻且发人深省的观点。这是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系统工程。因为这些研究内容涉及比较政治、国家治理、全球治理、文明比较等多方面和多领域的内容，所以有必要引入更多的研究力量对其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包括商榷、批评和改进。

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长期关注比较政治的前沿、热点和重点问题。徐达华先生关注和研究的多数核心问题与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长期追踪的问题领域有高度的交集。在经过与徐达华先生的充分沟通之后，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在徐达华先生的支持下设立了“华与罗世界文明与比较政治研究项目”。这一项目的合作时间为六年（2015—2021 年）。该项目具体包括：“国家治理指数”、“全球治理指数”、“华与罗比较政治大讲堂”等内容。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以笔者为首席专家和项目负责人，结合既有研究成果，集合本院全体研究人员，认真进行相关专题的深入和追踪研究，力争在国内外引起正面与反面的广泛



研究、探讨、商榷、评论与改进，形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系列研究成果。

本专辑的文章主要由“华与罗博客”以及本项目团队与“华与罗博客”对话的系列论文构成。本项目团队对“华与罗博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从中梳理出42个核心问题，具体如下（注：所列问题根据其出现在徐达华先生文章中的先后顺序排列）：

1. 政治体制改革的定义
2. 改革开放 30 多年的政治发展评价
3. 西方民主的经济基础 / 历史基础研究
4. 中国政治传统的总结研究
5. 最高领导任期制的多国比较研究
6. 选择统治者与统治的比较研究
7. 西方民主政治的缺失与困难研究
8. 协和式民主的多国比较研究
9. 民主的定义
10. 竞争性选举与协商性选举的理论研究
11. 世界主要指数的比较研究
12. 中印政治发展比较研究
13. 中国与英美法的发展中时期比较研究
14. 当前中国与 30 年前中国的纵向比较研究
15. 美国与欧洲价值观差异的比较研究
16. 欧美价值观与基督教的关系研究
17. 民主作为对外政策工具的运用研究
18. 中国民主发展的推进路径研究
19. 中华传统的对外关系模式研究
20. 中日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
21. 民主与民族模式的关系研究
22. 中华传统的民族关系处理方式研究
23. 中美民族政策的比较研究
24. 中国民主模式的特征分析

25. 西方民主的过程分析
26. 比较方法的系统与前沿追踪研究
27.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转型研究
28. 中华民主理论体系研究
29. 马克思与邓小平的政治观比较研究
30. 中华协商性选举民主与西方对抗性选举民主的比较研究
31. 北欧模式与中国模式的比较研究
32. 俄罗斯政治转型研究
33. 中俄政治发展比较研究
34. 未来文明间关系研究
35. 全球治理转型研究
36. 世界秩序的未来模式研究
37. 中国民主模式与对外关系的协调研究
38. 国家治理的定义与评估体系研究
39. 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与文化研究
40. 世界主要文明的历史演进比较
41. 中华文明在未来世界秩序中的地位研究
42. 中华文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未来关系研究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华与罗”是“中华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的简称。徐达华先生认为,世界文明中在政治领域最重要的两支是中华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在徐先生看来,希腊—罗马文明的现代载体不仅包括基督教文明,同时还包括伊斯兰文明。这两大文明都是希腊—罗马文明的继承者,其特点是善于征服,而不善于治理。现代世界除了中华文明与印度文明以外基本都被这两大文明所征服。但是,印度文明并不像中华文明这样能长期保持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能治理得有条有理,并且与周边的不同文明保持和平的关系。同时,希腊—罗马文明总是无法保持征服的成果,经常与外部发生冲突,并且内部时常发生分裂、冲突、内斗,甚至战争不断。徐先生对文明视野的强调,提醒我们不要陷入西方文明中心论的陷阱之中,提醒我们正视中华民族的历史和复兴。

笔者在这里尝试对徐达华先生所强调的“世界文明视角”做进一步的概括。



比较政治研究的世界文明视角可以总结为“大历史、大结构、大过程、大叙事”。这一视角基于历史学知识，但同时运用比较历史分析的研究。换言之，世界文明视角不再停留于微观史学，不是史料学和考据学，而是尝试进行历史的宏大叙事。这一视角的目的是发现大历史背后的权力结构与行为者互动。我们可以看到，视野开阔的大思想家往往都采用世界文明的视角，譬如马克思、韦伯、亨廷顿、汤因比等。

再进一步讲，比较政治研究的世界文明视角可以总结为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基于事实的宏观研究；第二，用关节点连贯截面而产生的过程研究；第三，从特殊性出发最后落于普遍性的归纳研究。

近年来，许多比较政治的学者都在思考，中国的比较政治如何前行的问题。杨光斌教授认为，复兴中国的比较政治研究的根本之道是推动比较历史分析的发展。这个观点与徐达华先生的观点实际上不谋而合。世界文明视角与比较历史分析的核心要义是一致的。

笔者认为，从世界文明的视角来研究比较政治需要两个阶段：第一，批判西方文明的普遍性，找到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各自的特殊性，以及各自的优点与欠缺，培养中国学者的知识自觉和理论自觉；第二，归纳出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中共有的普遍性，以及各自难以撼动的特殊性，重新定义许多被歪曲理解的政治概念，形成全新的、全面的比较政治学理论体系，以推动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交流和融合的贡献。这两个阶段都非常必要，且不能轻易跨越。同时，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也是正确理解中华文明与希腊—罗马文明之间关系的关键逻辑。

是为序。

高奇琦

2016年4月19日于华政松江校区

中国的发展不能偏离世界文明的大道

关于“世界文明与比较政治”的讨论，通常会出现两个向度：第一，不同国家的发展道路、模式的比较；第二，国家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就第二个向度来说，中国的发展与世界文明之间具有相互促进、和谐共生的关系，也就是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文明的大道。

从一般意义上讲，文明主要有两方面意义。从类文明的角度来看，文明是具有普遍性的。从亚文明的角度来看，文明更多的是体现不同国家之间的多样性。不管是哪一个层面，都应该看到文明的普遍性特质。类文明有其本质规定，更多的是承认普世性。而亚文明，尽管会体现各国、各民族的发展的特点，但也会有体现人类发展的共同性。

为了比较与区分，谈文明主要从共同性来谈，谈文化从多样性来谈。世界文明的普世性表现在物质层面、制度层面以及文化层面。在物质层面上，不管是原始社会、农业社会还是工业社会、信息社会，其发展进步都具有共同性，那就是技术的支撑和生产力的提高。当今所讲的信息文明、生态文明，都体现着信息化时代的共性。在制度层面上，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也体现出共同性。经济制度从个体的劳动走向集体的生产，从小农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一国经济走向国际经济，这是人类发展的趋势。政治制度从个人专制制度走向民主共和制，从人治走向法治，从一国政治到全球政治，无不反映了一种共同的发展趋势。社会制度也是如此，譬如，婚姻家庭制度、社会治理制度都在不断地变化。此外，国际制度在逐渐强化，因为单纯的国内制度已不能满足，人类日益在国际层面构建制度以协调和管理公共事务。在文化层面上，从迷恋工业文明现走向反思工业文明，从追求经济增长走向青睐可持续发展，从国家主义走向全球主义。

世界文明与各个国家之间有何关系呢？首先，我们应该客观地认识理解普遍



性与特殊性。人类不可能没有普遍性，不承认普遍性，就否认了人们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否认了社会生活的规范、社会生存的价值和意义。反之，特殊性也普遍存在，不承认特殊性，就否认了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丰富性，而各个国家的特殊性，正好孕育了人类文明的普遍性。因此，我们应该同时承认普遍性与特殊性。但是，正如拉兹洛所说，只看到差异性或只看到一致性都毫无意义，只有认识到由进化的洞察力揭示出的差异中的一致性，才是可贵的，才体现出真正的辨识力。因此，我们要更强调差异性和一致性的和谐关系，注重在差异中掌握一致性。同样，在各国的不同发展模式里，也能提炼出文明进程的一致性。

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存在着一种向普遍性、共同性以及一致性适度发展的倾向。当代中国应该如何发展，做哪些反思呢？一是不应过度迷恋特殊性、本土性、特色性。这种过度迷恋，不符合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二是正确认识和定位国家。今天我们所强调的国家治理，不能仅仅理解为提高国家与政府的治理能力，而忽视了民众的参与，忽视了民主问责与法治。我们应该着力向世界提供共同性的价值、理念和产品，而不仅仅是特殊性的东西。从共同性的角度阐述中国的故事、中国的实践，更能赢得世人的认同。总之，只有理性、审慎地认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和国家的历史作用，处理好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才不至于偏离世界文明的大道。

从中国当下的现实问题来看，如“一带一路”的研究，也应该更好地处理这种关系。目前，我们更多的是立足于中国角度谈“一带一路”，特别是地缘政治的角度去考虑。其实，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一带一路”看成是中国的，而应该视为世界的，从世界的视角来研究会发现更重要的问题。这里，我们应该关注三个视角：一是国际公共物品提供的视角。我们是在提供一个国际公共物品，学界应该加强这个方面研究的力度。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通过“一带一路”的建设倡导新的国际关系理念，力争逐渐摆脱现实主义与国家主义的束缚。今天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现实主义、国家中心主义的理念，它强调如何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而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引导人们反思国际社会中的现实主义倾向，倡导合作共赢的理念和人类共同利益的价值。三是“一带一路”的全球治理视角，强调“一带一路”是中国思考和参与全球治理大战略中一部分，体现了中国的全球治理理念与战略。关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问题，也是应当进一步加强研究的。

现在中国对于国别和特殊议题的研究并不够，对各国文明的研究也很欠缺，因此加强这方面研究非常必要。但是，从当下中国的倾向来看，对共同性、普世性的研究更欠缺，这是必须警惕、必须克服的。尽管 21 世纪初以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后，国家主义回潮成为全球的一大背景，但是人们还是要保持理性。因为根据进化的理论，在全球化的推动下，人类社会更多地向整体性、共同性倾斜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现在的欧洲难民危机是一大头疼问题，从现象上看似乎助长了国家主义，但若从国家边界管理被冲击、一国种族的多元化、人权和人道主义更受重视等角度讲，实际恰恰反映了世界主义的价值和理念，世界主义化越来越明显，这种趋势是无法阻挡的。

蔡 拓

写于中国政法大学

目 录

第一部分 引 言

中国民主化道路探讨	华与罗	2
-----------------	-----	---

第二部分 中西方文明的冲突与谐和

中西方文明世界秩序观的差异及其调和	高奇琦	66
文明共生的未来与“伊斯兰国”威胁		
——重读《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章 远	96
全球宗教复兴与基于信仰的国际危机治理	章 远	99

第三部分 文明视野下的国家治理模式比较

美国“弱耦合型”国家治理模式研究	游腾飞	110
角色转变与制度调适：英国国家治理与议会改革	严行健	123
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战略分布和策略组合	汪仕凯	135

第四部分 文明视野下的民主发展路径比较

西方民主发生理论辨析	汪仕凯	148
例外状态与赤裸生命：阿甘本对西方民主的批判	高奇琦	167
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观及其实践：1945—2012	郝诗楠	184



第五部分 协商民主的理论与实践

东亚协商政治与民主转型的比较研究：模式、理论与实践

——以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为例 阙天舒 198

我国民主政治中协商能力的构建：结构、规范与价值 阙天舒 207

第六部分 比较政治学的学科发展

试论比较政治学与国家治理研究的二元互动 高奇琦 216

论西方比较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理论路径的趋近 高奇琦 237

第七部分 比较政治学的方法研究

从单因解释到多因分析：比较方法的研究转向 高奇琦 260

比较政治学中的文化主义 章 远 283

第八部分 世界文明与比较政治会议综述

世界文明与比较政治会议综述 300



第一部分

引言



中国民主化道路探讨^①

华与罗

前言：邓小平突破了中国政治改革的瓶颈——一个被忽视的事实

近来读到新浪网在 2012 年 2 月 9 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标题为“周其仁：邓小平做对了什么”。该文为周其仁在芝加哥大学“中国改革 30 年讨论会”上的发言。文中他高度评价了邓小平的改革成果，但是有以下两段话引起了笔者的关注：

一，“1986 年 9 月，邓小平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为此，他开始部署中国政治体制改革。”

二，“‘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天安门广场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即使 1992 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并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竟的事业。”

周其仁是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这两段话不仅说出了周其仁一个人对中国改革事业的看法，或许可以这么认为：它代表了中国许多经济学家的观点，甚至中国许许多多知识分子的见解，也包括笔者自己以前的想法。

但是，中国的政治民主改革就是在大家都认为邓小平没能推进的时候，事实上却非常低调地、默默地走出了最关键的一步。从邓小平开始，中国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从终身制改变为任期制，突破了中国政治民主化前进道路上的最大障碍。30 余年的政治实践，几代领导人的规则性、程序化更替，中国的最高领导由终

^① 该文根据华与罗先生的博客整理而成。为符合作者原意，编者在尽可能照顾读者阅读习惯的情况下，保留了原先标题。此外，博客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徐艰奋律师在录入上的帮助，特此致谢。

身掌控着无时间约束的绝对权力，改革为受时间限制的相对权力。这一改革举措，突破了历史几千年来形成的，一元政治体制绝对权力难以约束的瓶颈，为中国的各项改革，包括进一步深入政治改革奠定了基础。

这30多年里，由美国主导的外部世界，政变、革命、战争、恐怖袭击、种属冲突、国家分裂，各种动乱不断发生。最终还爆发了从美国开始，向外蔓延的世界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这场危机已经持续了5年，导致世界更为动乱，不仅贫困的国家深受其害，甚至发达的美国与欧盟社会内部加深了经济、政治对立。唯有中国，虽然面临这种巨大困难与快速变动的形势，平稳交接的历届政府却能应对不断开放的社会中出现的种种问题，通过各项相应改革措施加以解决，稳步取得如此持续高速发展，而没有出现反复；在13亿人口的社会发生了如此巨大变动的时候，全体人民却能安享和平与繁荣。虽然还不断出现各种新的问题有待处理，但是这些问题与外部世界发生各种动乱，是无法相比的。

周其仁引证邓小平的那句话一点没错：“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改革体制继续前进。”如果中国没有进行这一最高领导任期制政治改革作为保障，很难设想这长达30多年能持续取得如此巨大的改革成功。

但是，保障了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使经济改革体制不断前进，具有如此历史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为什么周其仁却没能观察到，认为政治改革是邓小平未竟的事业呢？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笔者认为：因为中华文明的发展经历了几个世纪与外界隔绝与停滞，曾经与现代的外部世界发展现状大大脱节。在这西方主导与统治世界几百年里，西方社会已取得了富裕、发达的现实成果；非西方社会，包括中国却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状态；西方的理念已形成了系统的理论，被世界所公认；学习西方，西方化成为现代化的代名词。西方的竞争性选举，以及由此演化而成的竞争性多党制，也就被公认为人类政治民主唯一的可行形式。而且这种西方式民主政治又被普遍认为是西方社会富裕发达的原因，也是世界各国进步发展必须遵循的唯一模式。而现代以来我们自幼接受的教育，除了汉语以及少数学科外，又有哪些不是从西方引进的？我们许多杰出的知识精英多是留学欧美的，自然地接受了西方的理论和观点。



因为中国没有按照西方这种政治模式进行改革，就被认定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了。但是，随着近期中国社会迅速发展，改革成果的逐步涌现；同时，西方社会却出现了许多难以解决的困境，促使笔者重新思考这个结论。笔者对中西方文明两千多年的历史演进过程进行一次客观、全面、深入的重新审视后，竟然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关于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探讨之一

第一，一封邮件开始的讨论

三年前，一位友人发来一封邮件：内容为媒体对李泽厚教授的一次访谈。友人对李泽厚教授关于中国模式的观点大加赞赏。

李泽厚教授关于政治民主改革的提法，应该说是比一般缺乏思考的知识分子进了一步。后者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应该一步到位引进西方现在实行的多党竞争的民主政治制度。李泽厚认为：中国目前还不能进行政治民主化改革，还需要经济、社会、人民的文化素养提高到一定程度后，才可以进行。现在持他这样观点的人也很多，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也是其中之一。郑永年关于中国模式，写了好多文章，还到高校做讲座。他与李泽厚不同，专攻政治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曾任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政策研究室教授和研究主任。那年1月份（2010年），他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了一本书，名叫《中国模式——经验和困局》。书中反映出他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情况进行的研究。他从全球角度分析中国的改革进程，得出了与李泽厚类似的结论，并提出了一些建议。文章内容很翔实。有相当长一段时期，笔者和他两人也有类似的想法，但在时间的推移中，逐渐发现这种思路有问题，经不起仔细推敲。

他们两位提出的中国模式，实际上就是先进行经济改革，将经济先搞上去；接着再进行一些社会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待国家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再进行政治民主改革。说得白一点，就是到了一定时间，就可以按照西方现在的政治制度进行转型了。急改与缓改，两者之间的差别只在时间的先后上，对民主本身的认识没有两样。

那么，这个等待的时间是多长？要等其他改革到什么程度才能启动政治民主

改革？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到现在已经30多年了，还要等多少时间？再10年？20年？30年？在今天全球化时代，中国经济、文化、人员等各方面都如此开放。随着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经济总量超快速增涨，富裕人口的增加，贫富差别的扩大，各种利益诉求日趋复杂。需求，特别是精神需求的多样化，教育的发展，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全国已有1亿多人口接受了高等教育，2020年将达到2亿人口。数以万计、十万计、上百万计的学子进出于国门。在互联网时代，信息传播迅速，人们思想更趋多元等等，有可能让政治改革再等下去吗？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各地千差万别，在如此迅速现代化进程中，各方面变化如此之快，光靠国家行政系统能把中央的施政意图不走样地传递到基层吗？在全世界民主意识这么高涨的年代，唯有通过民主化，通过民主监督，才有这种可能。

回过头来再一看，这30多年来，假如没有进行相应的政治改革作为保障，经济、社会、教育、民生等各方面却取得了飞速的改革及发展，社会却又那么相对稳定，可以想象吗？其实，这30多年来，中国的政治早已开始进行了改革，民主化不断在探索、在深入、在试点、在试错，并已经取得了相当的成果。冷静地回顾一下，我们国家的政治气氛的改善是极其显著的。那种压抑的，令人说话、行动拘谨的氛围感觉不到了。对政府政策的各种批评意见在媒体上大量刊登；国家每一项重要法律制定都反复公开讨论，征求人民意见。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改革，能做到这样吗？只是他们对民主的理解被固化了，把民主的某种实现形式，欧洲人经过长期演化形成的西方民主制度的特异性，看作是全世界民主制度的普遍性了。

这种关于政治民主化的中国模式，还是脱离不了西方模式的大背景。他们的思维总是笼罩在西方三个世纪以来文化优势的阴影下，不能自拔。

关于中国民主化道路的探讨之二

第二，西方政治民主化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

（一）现代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不是一蹴而就的

很多人认为经济发展需要实实在在，一步一步进行的，因为它是看得见、摸得着，必须下大力气，一步一个脚印，来不得半点虚假。大跃进的后果大家都深有体会。但是很多人认为政治民主却不是这样：“民主，一人一票竞争性选举制